

人民日报

RENMIN RIBAO

1977年2月4日 星期五
第10437号

毛主席语录

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福建前线陆海空三军积极宣传群众组织群众

军民同批“四害” 发展大好形势

据新华社福州一九七七年二月三日电 为迎接打倒“四人帮”以后的第一个新春佳节，福建前线陆海空三军广泛开展拥政爱民活动。广大指战员发扬人民军队光荣传统，在地方党委统一领导下，积极宣传群众、组织群众，为群众做好事，为发展福建的大好形势贡献力量。

前线部队广大指战员，把协助人民群众学习和贯彻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论十大关系》和华主席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深揭猛批“四人帮”，作为拥政爱民活动的重点。这期间，许多部队派出宣传队深入工矿企业和农村海岛进行宣传活动。文化大革命中曾在龙海县的一百多个点上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济南第二团”，最近派出的宣传队带着毛主席著作和华主席的讲话，又来到当年工作过的地方，和干部、社员一起召开学习会、讨论会和批判会，回顾文化大革命的峥嵘岁月，痛斥“四人帮”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行，赞颂英明领袖毛主席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的历史功绩。李文忠生前所在部队组织了二百一十多个宣传组，分赴两个县的一百二十多个单位，辅导群众学习毛主席的《论十大关系》，批判“四人帮”的一系列罪行。他们把王张江姚“四人帮”的历史罪恶同现行反革命罪行联系起来；把“四人帮”迫害毛主席，陷害周总理，攻击华主席，阴谋篡党夺权的罪行同他们插手福建犯下的累累罪恶联系起来；把“四人帮”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狼子野心同蒋匪帮“反攻复国”的狂妄叫嚣联系起来，列成专题，深揭猛批。驻“同心岛”某部指战员和贫下中渔来到当年团结战斗过的“同心水庫”等地，回顾军民同心共建的历程，批判“四人帮”破坏军民团结的反革命罪行，重新修订军民联防的作战方案，决心更紧密地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步调一致，把海岛建成海上钢铁堡垒。

在拥政爱民活动中，前线部队广大指战员以最大的努力，热情支援地方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驻莆田地区某部，组织了六十二个支农工作组，翻山越岭，深入田头，地边为群众举办学大寨专题讲座，宣传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推动了山区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发展。驻平潭岛某部党委为配合当地农业学大寨运动，抽调了八十多个干部、战士，组成二十多个工作组，走遍全岛的渔场、生产队和知识青年点，挨家挨户进行宣传，使农业学大寨会议的精神家喻户晓。与此同时，各部队还利用执勤、训练的间隙和节假日，积极参加驻地农田基本建设。

前线三军指战员，在拥政爱民活动中虚心学人民，真心爱人民，热情为群众做好事。厦门前线的集美镇，是闽南地区的交通要道，春节之前来往旅客络绎不绝。驻守在这里的某部指战员，经常组织学雷锋小组，到火车站和汽车站为旅客服务。群众称他们是“雷锋精神火热的心，全心全意为人民”。

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我军纪律是毛主席建军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军战斗力的重要因素，也是把我军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防止变成个人野心家工具的重要保证。王张江姚“四人帮”视我军纪律为其乱军篡军的“紧箍咒”，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罪恶昭彰。

“四人帮”一贯无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原则，把自己凌驾于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之上，俨然以人民军队的“太上皇”自居。江青在军队里没有任何职务，中央也没有委派她过问军队，她却歇斯底里地叫嚣：“我就是要管军队”。她背着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也不通过各级党组织，直接插手部队，又是“慰问”，又是“探望”，以个人的名义到处抓“点”，写信，送材料，发指示，乱点名。她不顾毛主席、党中央关于一切军事行动必须有上级作战指挥系统命令的严格规定，窜到某部队炮兵阵地，强行夺过指挥旗，叫喊：“听我指挥，……给我打！”更有甚者，她竟以“我们四个人都不同意，我们没有批”为借口，明目张胆地否定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决定。她还厚颜无耻地狂叫“不听我的话，就是不听党的话”，就是执行了“黑线”。江青这一系列的丑恶表演和狂吠，和盘托出了“四人帮”乱军篡军的狼子野心。

“四人帮”为了破坏我军纪律，还制造了种种谬论。他们极力鼓吹“服从是有条件的”，反对我军一切行动听毛主席、党中央指挥。一九七三年末，毛主席在同军队一些领导干部谈话时，再次提倡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强调“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当全军正在贯彻执行毛主席这一指示的时候，王洪文竟跳出来疯狂反对，叫嚣什么“服从是有条件的，不是无条件的”，赤裸裸地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

在有阶级的社会中，每个阶级都有本阶级的权威和服从。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问题是权威权威来解决的”，“权威又是以服从为前提的”（恩格斯：《权威服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52页、551页）。伟大领袖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毛主席、党中央的指挥，集中地代表了无产阶级和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我们就是要自觉地无条件服从。王洪文鼓吹“服从是有条件的”，其目的就是要煽动人们随心所欲，各行其是，符合自己口味的就服从，否则就不服从，就“造反”。试问，这样一来，军队还有什么纪律，还有什么统一指挥？毛主席、党中央怎么能够对军队实行集中统一领导？

为了破坏我军的纪律，“四人帮”还挖空心思，想割裂纪律与路线的关系，妄图抽掉我军纪律的革命灵魂。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在审查《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令》的一次会议上，当讨论到“违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令”，“造成损失或严重不良影响者”，应根据具体情况给予不同的纪律处分时，王洪文阴阳怪气地说什么“违背党的路线不好衡量，不好掌握，不好执行”，恶狠狠地叫嚷“要去掉”。他的谬论遭到在场的其他领导同志的驳斥。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我党、我军的生命线，也是我军纪律的革命灵魂，是我军制订纪律的基础。纪律与路线是不可分割的。纪律是政治路线的产物，又是为



守卫在祖国北部边疆的人民解放军某部指战员与当地蒙古族民兵一起，深揭猛批“四人帮”破坏军民团结的罪行。

本报通讯员摄

粉碎“四人帮” 领导变坚强——西宁三个工厂的一个突出变化

编者按：大治之年如何治？“根本在路线，关键是领导”。在深揭猛批“四人帮”的斗争中，各级领导班子的路线端正了，思想政治工作加强了，职工队伍的团结增强了，又把合理的规章制度建立和健全起来，生产就能大上。西宁市三个工厂的变化就表明了这一点，只要路线正，领导坚强起来，事情很快就会起变化。

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祸国殃民的“四人帮”，使青海省工业战线出现了喜人的大好形势。从西宁的青海矿山机械厂、青海第三汽车修理厂、青海汽车制造厂，可以看到一个突出的变化，就是党的领导大大加强了，带动了革命和生产的蓬勃发展。

这三个工厂，大小不一，任务不同。但是，在打倒“四人帮”以前，有个共同特点：深受“四人帮”之害，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受到极大的削弱。早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四人帮”对抗毛主席的指示，提出什么要揪“孔老二的代理人”，三个厂的许多领导干部就被斥为“复辟派”，不能正常进行工作。去年，“四人帮”又搞什么“层层揪”，三个厂的党委被搞得四分五裂，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则受到践踏，组织发展、干部

调动、抓革命促生产等重大问题，不按“四人帮”的一套办就通不过。党的优良作风被败坏，甚至出现好人不善，坏人不良，干有罪，还有功的状况。去年，第三汽车修理厂年计划完成得很不好。汽车制造厂到第四季度发现组装材料供应紧张，只好东奔西跑，四处求援。工人们气愤地说：群龙无首，什么也干不好。想大干，组织不起来。有劲，使不到点子上。这样下去，学大庆就是一句空话。

粉碎“四人帮”，领导变坚强。三个厂的党委带领群众，狠揭猛批“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在斗争中认真进行党的建设。他们遵照毛主席的教导，除对个别坏人严肃处理外，在同志之间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他们对犯错

误的同志，会上帮助，会下谈心，思想工作做得很细。现在，这三个厂的领导班子越来越团结，大胆抓革命，促生产，对工作认真负责。第三汽车修理厂在“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下，出勤率一度较低。“四人帮”刚一揪出，这个厂的干部就连续走访工人家庭，做细致的思想工作，帮助工人解决困难。现在，除少数病

人外，都能做到出满勤。哪里最苦最累，干部就出现在哪里。这是三个厂干部的又一新风貌。矿机厂搞装岩机大会战，干部和工人一起出大力，流大汗。汽车制造厂党委有的成员身体有病，“四人帮”一倒，激动得闲不住，马上跑到车间，跟工人实行“三同”。在干部的带动下，工人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创造性大大提高，三个厂不断传来胜利捷报：去年，矿机厂和第三汽车修理厂，第四季度的产量超过前三个季度的总和。汽车制造厂在第四季度材料不足的情况下，提前十八天完成全年生产计划。今年一月份，这三个厂都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

本报记者

驻新疆解放军基建工程兵某部不怕困难

帮助边疆各族人民筑路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一九七七年二月三日电 驻新疆的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某部指战员，发扬人民军队拥政爱民的优良传统，积极支援当地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同各族人民互相学习，并肩战斗，推动了革命和生产的不断发展，进一步增强了军民团结。

这个部队负责修筑一条公路。这里，高山连绵，交通不便，修筑这条公路对于促进当地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改善各族人民的生活，对于加强战备，巩固国防具有重大意义。广大指战员遵照毛主席关于“为了帮助各兄弟民族，不怕困难，努力筑路”的指示，常年奋战在雪峰奇岭上，住帐篷，吃干菜，斗风沙，抗严寒，努力为各族人民筑路。许多领导干部坚持跟班作业，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战士们克服高山空气稀薄，气候变化无常等困难，大干苦

干。这个部队的九连一排，负责在悬崖绝壁上开辟一条四百多米的便道。战士们不怕苦，不怕死，每天抱着安全带悬在半空中施工。有些作业面太窄，人站立不了，大家就跪着、趴着打炮眼、搞爆破，硬是提前完成了任务。

这个部队的广大指战员还以共产主义战士雷锋为榜样，公路修到哪里，为人民做好事就做到哪里，满腔热情地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为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贡献力量。

子弟兵诚心诚意为各族人民服务，各族人民大力支援子弟兵。这个部队开到筑路第一线后，当地党政军领导机关经常组织人力物力协助施工，沿线的群众把自己的房子腾出来让给战士们住，当地的百货公司和新华书店的同志翻山越岭送货上门，附近的农牧民和学生还主动成立送水队、洗衣组、缝纫组为部队服务。

我军纪律绝不容许破坏

军事科学院批判组

一定政治路线服务的。只有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才能加强我军的纪律，才能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如果按照王洪文的胡言乱语，对违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行为都不实行纪律，还有什么无产阶级纪律？他们妄图以“不好衡量，不好掌握，不好执行”为借口，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从我军纪律中去掉，就是抽掉我军纪律的革命灵魂，从根本上瓦解、破坏我军的纪律，改变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使之成为其篡党夺权的工具。

“四人帮”还以反对“管、卡、压”为名，根本否定我军的条令，破坏我军的纪律。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五日，毛主席亲自批准，中央军委颁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纪律条令》。对此极为仇视。他们诬蔑军队贯彻执行新条令是“挥霍纪律的大棒”，“丢了大事”，“搞独立正，稍息”。狗头军师张春桥对《解放军报》宣传“两个条令”横加阻挠，诬蔑“不妥”。他们的亲信还把部队的一日生活制度诬蔑为“条条框框”，蛮横地提出，起床不准吹号，集合不准吹哨。有的同志抵制他们说：“这是军委条令规定的”，他们恶狠狠地说：“不管哪一级，都要顶住，对着干。”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和叶剑英副主席。他们说，不管任何阶级，任何政治集团，都有维护其本身利益的规章制度。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从属于正确路线，并经过多年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正确的规章制度，我们不但需要，而且必须坚决执行。

毛主席对我军的条令极为重视，早在我军创建初期，毛主席就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指出，要“编制红军法规”。一九五八年，毛主席又指出应该集中一批有丰富工作经验和战斗经验的同志，搞出自己的本战斗条令来。毛主席亲自批准，中央军委颁发的内务条令、纪律条令，就是我军执行毛主席建军路线的一个法规，是全军整齐划一令行禁止的依据。它具体体现了毛主席建军思想和我军的光荣传统，对于统一全军的思想和行动，搞好整军备战，加强部队革命化、现代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人帮”妄图否定我军的条令，就是反对毛主席的建军路线，根本取消我军的纪律，破坏我军的建设，破坏我军的战斗力。

对于“四人帮”插手军队破坏革命纪律的罪恶活动，伟大领袖毛主席早有察觉，严正告诫他们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穷凶极恶的“四人帮”，对毛主席的指示阳奉阴违，继续肆无忌惮地破坏我军纪律。这是他们反动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的。因为，只有破坏我军的纪律，造成军队大乱，他们才能在乱中篡夺军权。列宁指出：“个别的人，特别是那些觊觎领袖职位而未能如愿的人，会长期坚持错误（如果他们缺乏无产阶级纪律性和‘光明正大的态度’的话）。”（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4卷第259页）。列宁的话不正打中了“四人帮”的要害吗？今天，“四人帮”这些现职领袖职位，妄想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已被摆上了历史的审判台。我们一定要加强无产阶级革命纪律，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一切听从党中央的指挥，永远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浩然巾”下的右派嘴脸

——评姚文元的一篇反党文章

钟广屏

一九五七年五月，正当资产阶级右派打着“帮助党整风”的旗号，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达到高潮的时候，反革命两面派姚文元写了一篇题为《一点补充》的文章。此文有一个副题：“与若望同志交换一点意见”。右派分子王若望一九五七年四月发表了一篇反党文章，题为《步步设防》。这篇文章打着反对教条主义的幌子，肆意攻击和妄图取消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恶毒地把党的领导诬蔑为“筑堤坝”、“步步设防”，公开反对报刊要有无产阶级的立场，猖狂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而姚文元的《一点补充》就是对王若望这篇大毒草的补充。

所谓“一点补充”，其实又何止一点，关键的“一点”就在文章的开头一段。姚文元写道：“现在我们要进行既反对教条主义又反对机会主义的两条战线的斗争，但首先是着重反对教条主义。”他解释说：“因为教条主义思想有很深的思想影响，是‘放’和‘鸣’的拦路石”，“因为庸俗机械论的文艺思想还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和市场”，所以，“教条主义不经过反复的思想上的批判不会退出阵地”。

在当时，资产阶级右派向党进攻，喊得最响的是“反教条主义”。他们把教条主义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产物和代名词，叫喊什么“共产党培养了可怕的危险的教条主义者”，有的甚至公开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胡说什么“教条主义来源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十分清楚，右派分子是借反对教条主义之名，行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之实。姚文元此时此刻居然提出要“首先是着重反对教条主义”，他同资产阶级右派完全站在一块向党猖狂进攻。姚文元要撤掉“放”和“鸣”的拦路石，为的是让右派哥们儿“大胆放”、“大胆争”，

好“杀共产党的头”，“叫共产党下台”。姚文元要反对“庸俗机械论的文艺思想”，这和当时右派分子攻击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言论如出一辙。

姚文元在文章中还斥责广大共产党员“对当前社会的大变动缺少了解”。他所说的“当前社会的大变动”和当时右派分子手舞足蹈地喊出来的“大变动的前夜到来了”完全是一个含意，表露了他们急不可待地梦想变天、复辟资本主义制度的共同心声。把姚文元当时的言论同右派分子的言论比较一下，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姚文元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漏网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一点补充》一文，第二年被姚文元收在他的一本名叫《在革命的烈火中》的集子里。在收入集子的时候，姚文元作贼心虚，慌忙对原文进行了多处重要删节和改动。有的地方砍的支离破碎，伤痕斑斑，就象罪犯仓惶逃遁时留下了来不及销毁的罪证一样。人们拿他的改稿与原文一对照，就可以看清这个假革命的反革命两面派伪善而无耻的嘴脸。

首先，所有对王若望的右派观点、反党言论表示赞同的语言，他统统砍去，一字不留，以至使改稿几处露出破绽，下句不接上句。而且，在副题里的“若望同志”前加了一个“王”字，以避与右派分子过分亲近之嫌。

其次，对涉及“反教条主义”的地方，作了大量的删节。这恰恰进一步证明他的“反教条主义”是别有用心。他自知露了马脚，不得不有所收敛。但仍保留其基本观点，继续放毒。

第三，在攻击“很多基层的共产党员”“还是在某种程度上用阶级斗争时期的老眼光看今天的新问题”

一段话中，既删去了“很多基层的共产党员”一句，又删去了“阶级斗争时期”的七个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删改。但是，已经晚了。有原文在，姚文元二十年前就是一个“阶级斗争熄灭论”的鼓吹者的铁证也就在。在他看来，中国在一九五七年以前就不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了，已经进入了“无阶级斗争时期”。广大干部、群众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分析、揭露和批判资产阶级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却被他斥之为“老眼光”。姚文元企图用“阶级斗争熄灭论”掩护右派分子向党进攻，这完全证明他是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忠实追随者。

第四，公开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美化毒草作品的三段话被一笔勾销。

姚文元的修改本是一个漏网右派的抵赖术，一个反革命两面派的伪装术。在自以为有利的时机气势汹汹、张牙舞爪地向无产阶级发起进攻，一旦发现风向不对，便赶紧退却，遮头藏尾，粉饰自己，然后再做一批显得比任何人都“左”、都“革命”的文章，自欺欺人，冒充英雄。这就是姚文元的一套反革命策略。反右斗争开始后，姚文元又是写“小品文”、大文章，又是写《党魂》，还恬不知耻地声称同右派分子王若望进行过“争论”和“辩论”。他就是用这些见风使舵的伎俩、欺骗群众的谎言，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反右英雄”的。姚文元当时在一篇文章中曾把一个他所熟悉的右派分子比作《镜花缘》里的“两面人”。这种两面人，“头戴浩然巾，都把脑后遮住，只露出一张正面”，表面上道貌岸然，满面横肉，“血盆口一张，伸出一条长舌，喷出一般毒气，霎时阴风惨惨，黑雾漫漫”。这不恰恰也是文痞姚文元自己的绝妙写照吗？揭开在他头上的“一贯正确”的“左派理论家”的浩然巾，站在我们面前的就是这样一个面目狰狞的反党反人民的十恶不赦的恶鬼。

（原载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光明日报》，本报有删节）

是“反林英雄”还是林彪一类

北京印刷厂批判组

世界经济研究所下厂小组

王张江姚“四人帮”恬不知耻地给自己戴上一顶“反林英雄”的“桂冠”。江青在林彪折戟沉沙以后，假借悼念就说什么“我让林彪迫害的厉害呀”，“这几年来，他采取种种阴谋毒辣的手段，想把我干掉”呀，竭力把自己美化成“反林英雄”。

果真如此吗？历史是无情的见证。林彪曾大肆吹捧江青“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有丰富的实践经验”等等，把这个在三十年代曾为独夫民贼蒋介石“祝寿”演出的反动演员捧上了天，赐给她“文艺革命旗手”等等“桂冠”；他那个臭老婆叶群，还到处带头喊叫“向江青学习”，“向江青致敬”。江青则以“副帅”、“紧跟”、“高举”等高帽子回敬林彪，带头高呼“永远健康”。直到自己的阴谋快要败露时，林彪还念念不忘这个曾经为他抢班夺权效过犬马之劳的女干将，赠与西瓜，以资鼓励。世界上有这样的“受害者”吗？

江青说，她“早就知道林彪不跟毛主席干革命”。然而，这个“知道”并不能成为“反林英雄”的根据。相反，却正好说明她与林彪的关系非同一般。“早就知道林彪不跟毛主席干革命”，为什么还要与林彪互相勾结，狼狈为奸？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林彪一伙叫嚷什么“要革‘革过命的’的命”，跟跟随毛主席南征北

战的老干部要杀一批、关一批、要一批。对于林彪的这一阴谋，“四人帮”心领神会，密切配合。江青四出游说，到处煽动，拿起“大叛徒”、“反革命”、“顽固坚持资反路线”等大帽子，横飞乱扣；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也一齐动手，抡起反革命的大棒，到处乱打。“四人帮”和林彪一起，对批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指示，大搞“打倒一切”，企图给革命老干部统统扣上“走资派”的帽子。甚至把矛头指向敬爱的周总理，伙同林彪一伙，大搞

这里，毛主席向我们揭示了一条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物极必反。当年，高岗反党集团阴谋弄手段，到处搬石头打人，最后反而打倒了自己。无独有偶，二十年后的王张江姚反党集团，也重蹈了高岗的覆辙。他们专搞“有棱有角”的“石头”来打人。辽宁不是有所谓“空白卷”的大学迷张铁生吗？就是“四人帮”拣的“有棱角的石头”，岂但“有棱角”，照他们的话说，而且“身上还长刺”。他们扬言，要“拿起这块石头打人了”！凡是不赞成他们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要打；凡是阻碍他们实现篡党夺权野心的，要打；特别是周总理这样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更要打。“打”还不算，还要“杀”，并且扬言要采用“铁的手腕”，要“斩首示众”，“要一个省的招供”。他们确实是这样一阵，猖狂了一阵。他们走到了自己主观愿望的极点。

“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惩罚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82页）“四人帮”整天太甚，想一石头把无产阶级砸扁，结果和高岗一样，使他们同无产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对立之中。人心丧尽，成了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很有点物极必反的辩证法。现在，我们再把这两句话来“移植”搬石头打人不成、反而打倒了自己的“四人帮”，倒也是颇为合适的。

为什么不准用“大庆人”、“大寨人”？

编辑同志：

“四人帮”把持的一个刊物，很少刊登读者来信、建议之类的文章。一九七二年，忽然破例地刊出一则“建议”，说“大庆人”、“大寨人”的提法不妥，建议不要再用“××人”这种提法。理由是：这种提法“不是一个贯穿阶级分析的科学概念”。

一则小小的“建议”，因为发表在被“四人帮”把持的理论刊物上，当时我们就议论开了。大多数同志认为：“大庆、大寨是毛主席亲自树立起来的两面红旗，用‘大庆人’、‘大寨人’来代表战斗在大庆和大寨的英雄人民，是恰如其分的。”“大庆人”、“大寨人”的提法，人们一听，就很自然地想到了它的真实含义，决不会死搬硬套后面的“人”字里，包括不包括地、富、反、坏、

毛主席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指出，“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用“中国人”三个字来代表赶走了日本帝国主义、打垮了美帝国主义支持的蒋介石反动派的中国人民，非常明白，读起来豪劲有力。如果照“建议”的意思，这段语录里的“中国人”，也“不是一个贯穿阶级分析的科学概念”，岂不是谬！

为此，我于一九七四年十一月，曾写信给“四人帮”把持的这个刊物的编辑组，阐明我的意见。但这封信发出后，石沉大海，一直没有得到答复。

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我才明白了，“四人帮”不准用“大庆人”、“大寨人”的提法，就是为了砍倒毛主席亲自树立的这两面红旗。

山西省平陆县广播站

韩明法



“清君侧”的反革命阴谋。

林彪想要浑水摸鱼，总嫌乱得不够，拼命叫嚷“要弄得翻天覆地”。江青就抛出“文攻武卫”的反动口号，举着拳歌嘶底里地叫喊：“谁要是向我进攻，我就要还击”。“四人帮”的其他成员也甘当走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都亲自上阵，指挥和煽动武斗，严重地破坏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制造了“全面内战”的恶果。

“四人帮”就是毛主席指出的“林彪一类”。他们同林彪反党集团一样，都是要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他们和林彪一样，打着红

旗反红旗，肆意篡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搞修正主义，在国内国际一系列问题上，猖狂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推行一条极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他们效法林彪，拉山头、搞宗派、自成体系，分裂中央；他们同林彪一样，大搞阴谋诡计，企图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党政负责同志，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当他们的阴谋败露后，就拿出当年林彪反党集团曾出过的最后一着，破釜沉舟，企图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总之，“四人帮”承袭了林彪反党集团的一切，是货真价实的林彪一类。

江青的“怕”

江青时常窜到各地，气势汹汹、声色俱厉地嚎叫：“老娘不怕！”“我怕什么，我什么都不怕！”

人们不禁感到奇怪：窃踞了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自封为毛主席的“学生”和“战友”的江青，为什么这样起劲地念起“怕”与“不怕”的咒语来呢？揭穿来看，也不奇怪。江青所以到处叫喊“什么都不怕”，正是为了掩盖她“什么都怕”的内心世界。她总是处在作贼心虚、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

的精神状态中。所以她跟人谈话，常常先是大发淫威，为自己壮胆，末了，又心虚地加上一句：“你是不是听到我什么了？”“你又听到关于我的谣言了吧？”甚至还会突然“诈”你一下：“你又在背地里骂我了吧！”真是色厉内荏，丑态百出。

要搞阴谋诡计，又怕被人揭穿。心怀鬼胎，假装正经。这个角色确实不太好看，即使对于当过演员的江青来说，也有力不胜任之感。

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以文化大革命“旗手”自居的江青，就到处散布有人整她的“黑材料”，还声色俱厉地宣称：尽管材料是一箱一箱的，但是，“我不怕”。既然不怕，那还说它干什么

呢！其实，不怕是假，她早就为揭发她的严重问题的人准备好了“帽子”和“棍子”了。一九七四年下半年，江青为其篡党夺权的野心所驱使，迫不及待地破门而出，想要“露峥嵘”。她胡诌了一首“江上有奇峰”的反党黑诗，送到《中国摄影》杂志要求发表。但是，她又要求人家绝对给她“保密”。就这样，她还放不下心，清样打出后，又急急忙忙地把那篇反诗收回，不许发表了。事情很清楚，她是怕“时机未到”，过早地露出狐狸尾巴。江青这种精神变态愈演愈烈。就在毛主席逝世前几小时，她又疑神疑鬼，气急败坏地窜到北京新华印刷厂，伙同雌黄，肆意污蔑党中央在她身边派了所谓“特务”，在搞她的什么“情报”。面对新华印刷厂的革命职工，江青如临大敌，竟声色俱厉在地威逼工人向她“自首”！这就充分暴露了江青怕得要死、吓得要命的狼狐丑态！

“四人帮”要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就必然要亿万人民反对，把自己置于广大群众的对立面。他们心虚胆怯，总是害怕人民起来揭穿他们，打倒他们。害怕人民，害怕群众，这就是江青一伙野心家、阴谋家的精神世界。

鲧鱼的眼泪

沈阳部队后勤部大批判组

一九七四年八月，大野心家江青看到一份反映某边防部队后勤保障问题的材料，如获至宝，立即在上面批了这样一段话：“我看了这份材料也流了泪，此事军委应及时解决。”并在后边用括弧注明，这份材料不送主持军委工作的某领导同志。江青的这几句“批示”，字数虽少，却包藏着极其险恶的反革命祸心。

这份材料反映了某边防部队后勤供应上存在的“一些问题”，有些情况并不真实。然而，这样一份反映一般问题的材料，为什么会让江青如此难过，甚至流了眼泪呢？说穿了，这纯粹是做给别人看的。

江青曾经喋喋不休地嚷嚷：“我对解放军很有感情，军服上的‘红星、红旗是我争来的’，等等。可是，就是江青这一帮，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伙同林彪，极力鼓吹“揪军内一小撮”，今天说这个“黑司令”，明天骂那个“大土匪”。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他们咬牙切齿地叫嚷“就是要整整军队”，要“放火烧荒”。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中，他们又煽动搞“军内资产阶级”，揪“戴红五星、红领章”的“走资派”，妄图打倒一大批忠实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军队负责同志。这样一个对人民解放军怀着刻骨仇恨的家伙，居然为同志边防战士的生活而“伤心”“流泪”，岂非咄咄怪事！

鲁迅说得好：“即使眼脸上确有珠泪横流，也须检查他手巾上可浸着辣椒水或生姜汁。”江青一贯擅长利用各种机会，装出伪善的面孔，收买人心。“眼泪”也是她的这种手法之一。按照她的如意算盘，文件一转发，她就自然成了最关心部队、最爱护战士的“观音菩萨”了。

江青的黑“批示”后边括弧里的话，更泄露了江青一伙篡军乱国的天机。既然是军队的黑，可不让主持军委工作的主要领导同志知道。这葫芦里装的是些什么药，不是一清二楚了吗？她曾恶狠狠地说：“我是一个过河卒子”，就是要吃掉他那个“老师”。江青把军委主要领导同志撇在一边，擅自批文件，发指示，不就是企图吃掉“老师”，取而代之。殊不知这样一来，恰恰暴露了江青的狼心，不过是鲧鱼的眼泪，骨子里却包藏着“四人帮”一伙阴谋毁灭长城、篡党夺权的险恶用心。

“小本本”与其他

南京部队炮兵某部 凌亮

“小本本”与“大本本”

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讲到唯物辩证法的两点论时，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我们的支部书记，部队的连排长，都晓得在小本本上写着，今天总结经验有两点，一是优点，一是缺点。他们都晓得有两点，为什么我们只提一点？”

这个例子，通俗，深刻，耐人寻味，发人深思。我们党的支部书记，我们部队的连排长，他们的小本本上，虽然只记载着普普通通的工作，但就是在这种最常见、最普通的工作中，渗透着唯物辩证法的深刻哲理，闪烁着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光彩。

由此而想开去，想到了一种威威赫赫的“大本本”——“四人帮”控制的舆论工具。那里面，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尽是些“知其一不知其本”的一点论，与毛主席赞扬的那种“小本本”正好相反。比如，讲到“阶级斗争为纲”，就是“宁愿两年不搞生产，也不能一年不搞阶级斗争”，取代之。殊不知这与“目”这两点，孤立地变成了一点。讲到“形势大好”，就是“怎样

估计了也不会过高”，似乎一点缺点和问题都没有了，谁要是实事求是地反映一些问题，则落个“九斤老太”之嫌，重则给你戴上“恶毒攻击”的大帽子。真是“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盛行！“四人帮”的这些“大本本”，真是形而上学的活标本。而他们却把自己自诩为“理论家”呢！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用党的支部书记的“小本本”为例，教育全党坚持唯物辩证法，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分析问题，做好工作。而那个自诩为“基本上是个马列主义者”的白骨精江青，有一次窜到天津，口口声声地训斥什么：“不要以为一个小小的支部书记就做了大官罗”！很不以“小小的支部书记”为然。这是“四人帮”这伙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典型代表的丑恶嘴脸的又一暴露。

搬“石头”打人与打倒自己

毛主席在讲到“是非关系”的问题时，深刻地指出：“我们要注意，对犯错误的人整得过分，常常整到自己身上。高岗本来是想搬石头打人的，结果却打倒了自己。”

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来共同努力于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毛主席的谆谆教导，是我们前进的指路明灯。

我们是瑶、壮、汉、苗、侬佬、毛难、回等七个民族杂居的大石山区。解放前，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山霸制造民族分裂，残酷压迫和剥削各族人民，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贫苦农民长期过着

“衣不蔽体，吃不饱餐，债台高过盘古山”的悲惨生活。解放后，在毛主席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都安各族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走上了社会主义金光大道，生活好比芝麻开花节节高。各族干部、社员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心想在一起，动在一块，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发扬壮志压倒万重山的革命精神，共同建设新都安，使历史上的缺粮县变为余粮县，农业上去了，县办的五小工业也上去了，文教卫生事业也蓬勃发展了。事实证明：什么时候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处理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加强各族人民的团结，人的积极因素就能充分调动起来，革命和生产就能蓬勃向前发展，无产阶级专政就能巩固。反之，民族关系处理不好，团结搞不好，就会挫伤各族人民的革命积极性，就会影响革命和生产的发

展。毛主席在论述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中还指出：“历史上的反动统治者，主要是汉族的反动统治者，曾经在我们各民族中间制造种种隔阂，欺负少数民族，这种情况所造成的影响，就在劳动人民中间也不容易很快消除。”二十年来的斗争实践，使我们深深体会到：要消除反动统治阶级在民族中制造的种种隔阂，肃清其影响，搞好民族团结，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在阶级社会里，每一个民族都是由不同的阶级组成的，都存在着阶级对立。正如我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说的那样：“民族矛盾，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我们所讲的民族团结，说到底，是阶级的团结。我县雅龙公社镇安大队歪生生产队，四十二户人家，有瑶、壮两个民族，开始时团结搞不好，为什么？原来是一个反革命分子在煽风点火，点鬼火，说什么“猪羊不能同栏，瑶壮不能同寨”、“瑶壮不同祖，何必共耕土”，破坏民族团结，造成人心分散，粮食减产，集体经济发展不起来。我们组织两个民族的贫下中农认真学习党的基本路线，讨论是阶级亲还是民族亲？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后，大家说：“民族不同，苦同根，解放前都是受地主压迫剥削的。”从此，两个民族的贫

加强民族团结,共同建设社会主义

——学习毛主席《论十大关系》的体会

中共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委员会

下中农团结起来，批斗了那个反革命分子，并肩战斗，治山治水，发展集体养猪，粮食连年获得增产。事实充分说明，一切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革命分子，为了达到其破坏革命的目的，总是要在革命队伍中、在各民族之间制造分裂，破坏团结。王张江姚“四人帮”为了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也是千方百计制造民族分裂，破坏民族团结。要处理好民族关系，加强各民族之间的大团结，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深入批判“四人帮”，把他们分裂党、破坏民族团结，搞修正主义的罪行批深批臭。

“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不然它为什么能存在？为什么能发展？同时，每个民族也都有它的短处。”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用马克思主义的两点论观察民族问题的光辉思想，也是我们处理民族关系、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的一条准则。对于这个间题，我们在实践中，体会尤为深刻。我县下塘公社吉隆大队和板岭公社八达大队，是同饮一井水，同耕一垌地，同打一座山的兄弟社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八达大队大部分耕地年年都受涝。要排除涝灾，必须于吉隆大队地界的一个山隘打穿山隧洞。可是，由于国民党反动派长期统治造成的民族歧视没有消除，吉隆大队的汉、壮族和八达大队的苗族长期闹不团结，不愿互相帮助，隧洞一直没打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组织几个民族的贫下中农认真学习党的民族政策，引导大家总结自己的长处，找自己的短处，既反对大汉族主义，又反对地方民族主义，消除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歧视。两个大队的汉、壮、苗族社员同心协力，共同奋战，两年时间就打通了一条长达三百多米的石山隧洞，并在洞的两头挖通了总长二千多米的排水渠，使两个大队三千多亩土地根除了涝灾。两个大队粮食都获得连年增产。在毛主席和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全县各族人民团结战斗，在治山治水的过程中，出现了许许多多象征民族团结的“友谊路”、

“同心桥”、“团结水库”、“团结电站”等农田水利工程，有力地促进了全县农田基本建设的开展，为建设大寨县做出了贡献。

在处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中，我们还体会到，必须首先处理好领导班子中各民族干部之间的关系。我们除了经常组织各级干部学习马列和毛主席有关团结问题的论述，坚持“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则外，还

团结，全县上下一条心，千群拧成一股绳，战天斗地，使都安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

回顾过去，我们豪情满怀；展望未来，我们信心百倍。有毛主席的《论十大关系》指航向，有英明领袖华主席为我们掌舵，我们一定能够进一步加强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大干社会主义，为尽快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

吉林省军区边防某部学习毛主席的《论十大关系》

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制定的民族政策

本报讯 据《吉林日报》报道：

常年驻守在朝鲜族聚居的图们江畔的省军区边防某部，经常对干部、战士进行民族政策教育，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制定的民族政策。最近，部队党委又认真组织广大指战员反复学习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论十大关系》中关于正确处理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的论述，学习华主席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揭发批判“四人帮”破坏民族团结，破坏军民关系的滔天罪行，进一步加强了同驻地少数民族的团结。

他们把进行党的民族政策教育作为部队政治思想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积极主动抓好，编写宣传教育提纲和学习材料，进行经常性的教育；在节假日对干部、战士进行专题教育；利用边防巡逻执勤、

助民劳动等机会，或组织宣传小组，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宣传毛主席制定的民族政策，检查薄弱环节，总结经验，制定落实措施。这个部队的三连为了提高粮食产量，调粮食品种，把连队附近的一块地改成了稻田，后来发觉这样做，会造成附近的一个朝鲜族生产队的菜地减产，于是立即平掉了已打好的田埂，放弃了原来把这块地改种水稻的计划。

为了进一步密切和驻地少数民族的关系，便于开展工作，他们采取多种形式，组织部队学习朝语，学习朝语歌曲，演唱朝语文艺节目。干部、战士都尊重朝鲜族的风俗习惯。他们外出巡逻执勤、训练演习、助民劳动，都同朝鲜族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在一起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一起批判“四人帮”。

这样，干部、战士和少数民族的感情更融洽了，和边疆各族人民的心贴得更紧了，开展工作也就更顺利了。

他们还经常派出医务人员，帮助驻地朝鲜族群众培训赤脚医生；派出干部、战士任校外辅导员，帮助学校开展教育革命；帮助训练民兵。延吉县三合公社的一个朝鲜族知识青年集体户，准备养猪，驻地的三连知道后，就把连队的小猪娃送给知识青年集体户，帮助他们发展养猪事业。

前不久，部队还派出大量的人员到驻地朝鲜族大队帮助搞农田基本建设，同驻地朝鲜族贫下中农一起批判“四人帮”破坏学大寨运动、破坏边疆建设的罪行。朝鲜族社员感动地说：边疆的土地上，浸满了解放军的汗水呀！

向新胜利进军

成了六千个钢圆的落料任务，一天干了过去要两天半的活。青年磨工李兴德，为了尽快磨出机床上急需的设备——范形杆，上了早班中班，一天干十多个小时。青年女工邹建芳，对“四人帮”破坏革命、破坏生产的罪行早就看在眼里，气在心里。她家离厂里有十多公里远，无论刮风还是下雨，有公共交通还是没有公共交通，她总是抱着还在吃奶的小孩，按时赶到厂上班。一年之内，她没有迟到过一次，没有旷过一天工。今年，小孩断了奶，邹建芳的劲头也更大了一些。她每天总是提前半个小时来到厂里，打扫车间，擦拭好机器，为生产做好准备工。

生产科和供销科的同志们，面向生产第一线。他们主动把材料、零件送到车间、班组。化验员到炉旁取样化验。检验员一边参加生产，一边检验，及时发现和解决质量方面的问题。去年，“四人帮”一垮台，工具车间的工人们就在伟大胜利喜讯的鼓舞下，千方百计提前为增加生产作好准备，年前就为今年准备了足够使用的半年的专用刀具。通过学习毛主席的《论十大关系》和华主席的重要讲话，大家决心得更坚定了。为了提高生产效率，他们自己动手搞五台专机，用来代替手工磨制刀具。元旦一过，设计、制造专机的战斗就打响了。

为了克服原材料供应暂时遇到的困难，江西手扶拖拉机厂党委已经组织力量，进行清仓归库，同时发动群众，千方百计节约用料。供销科下料间的同志们，每一次下钢板料时，都要通盘考虑，反复比划计算。铜柱下料时剩下的零星钢头，他们都——标上品种、规格、型号，能用料头的就不下整料。老工人、共产党员江定国，到处收集边角余料，能加工成零件的就加工成零件，不能加工零件的就上废厂里。老工人桓国荣看见车间里堆放着三百多根报废的齿轮轴、犁刀轴和半轴，非常心疼。他使用五、六个晚上和上午的时间，一根一根地进行修复，使这些废品在生产中派上了用场。

新华社记者（本报有删节）

乘东风 批“四害” 下决心 排万难 把四川尽快建成新“天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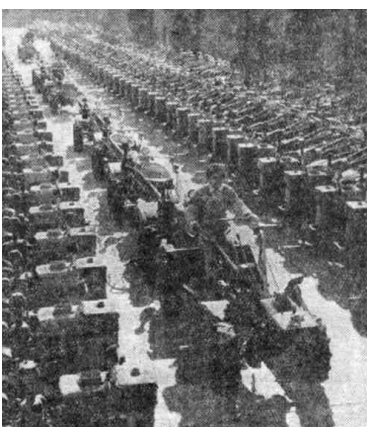
据新华社成都电 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的鼓舞下，四川省广大干部和群众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象火山一样爆发出来。他们迅速把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战斗号令贯彻到实际行动中去，广泛揭批“四人帮”，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大打农业翻身仗，尽快把四川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新“天府”。

为了使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家喻户晓，深入人心，省委召开了二十万人的大会进行传达，并根据会议精神提出了当前的战斗任务和长远的奋斗目标。省委号召全省人民：树立信心，提高勇气，振作精神，鼓舞斗志，大干苦干拼命干，努力打好农业翻身仗。各县县委都召开了县、社、队三级干部会，进行传达、动员和部署。目前，全省已有十万元以上干部奔赴第一线，组织和带领群众学大寨、宣传、落实会议精神。省、地、县各级的工交、财贸、文教、卫生等部门，都纷纷制订了支援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贡献力量的规划。全省城镇工矿企业、机关、学校、商店、街道都准备在春节期间开展一次送肥下乡的大规模农交活动。

四川省广大干部和群众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论十大关系》，学习华主席的重要讲话和陈永贵副总理的重要报告，把批判“四人帮”的“三反一砍”、篡党夺权罪行，作为最现实、最深刻的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的重要内容，掀起批判“四人帮”的新高潮。大批促大干，全省农田基本建设、越冬作物田间管理和春耕生产也搞得热火朝天。在传达会议精神的过程中，仅参加农田基本建设的劳动力即达一千三百多万人，仅一个月前猛增八百多万人。去年遭受自然灾害和“四人帮”干扰破坏比较严重的万县、南充、绵阳等地区，传达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后，群情大振，百分之四十以上的劳动力开上了改田改地、治山治水工地，冬闲变成了大忙季节。群众说，越是困难越需要大干，只有大干才能战胜困难，只有大干才能夺回天和“四人帮”造成的

损失。全省各级领导成员大部分深入到农业第一线，蹲点劳动，调查研究，切实加强了对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的领导，上下一致，齐心协力，一定要把四川的农业搞上去，把各项生产建设搞上去。

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农业生产有巨大的潜力和广阔的前景。伟大领袖毛主席曾经作过“四川很有希望”的预言。敬爱的周总理曾经殷切地期望“四川要后来居上，万象更新”。通过对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的贯彻落实，四川省的干部和群众信心百倍，他们说，踢开了“四人帮”这堆绊脚石，我们要迈开双脚，跑步前进，让巴山蜀水万象更新。



江苏盐城拖拉机制造厂职工，进一步发展生产的大好形势，产量不断上升，为农业生产提供农机做出了成绩。这是一批拖拉机正待出厂。

新华社记者摄

除“四害”心欢快 甩开膀子学大寨

广西农村掀起冬季农田基本建设高潮

据新华社南宁电 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的鼓舞下，广西壮族自冶区农村广大干部和社员群众把在揭发批判“四人帮”伟大斗争中焕发出来的冲天干劲用在进一步改变农业生产条件上，迅速掀起了以治水改土为中心的季节农田基本建设高潮。五百六十多万劳动大军顶着寒风，冒着细雨，艰苦奋战。目前，全区已动工的两万四千多处农田基本建设工程，有五千七百多处已经完工，新增加灌溉面积十九万亩，造田造地达二十三万多亩，建成大寨田三十三万亩。

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胜利闭幕后，广西各级党委认真组织广大干部和社员群众认真学习毛主席光辉著作《论十大关系》，学习华主席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陈永贵副总理的重要报告。同时，抓住“四人帮”篡党夺权这个要害，广泛发动群众，联系农村实际，深揭狠批“四人帮”反对大批修正主义，反对大批资本主义，妄图颠覆大寨红旗的罪行。通过学习和批判，使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大意义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各族干部和贫下中农高兴地说：除了“四害”人心大快，甩开膀子学大寨，敢把山河重安排。入冬以来，广西各地尽管天寒多雨，但是到处是一派大干社会主义的景象。打倒“四人帮”以后，广西农田基本建设与过去相比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人们的思想大解放，敢想敢干、自力更生精神大发扬。不少县、公社、大队出现了这样情况：原来不敢干的工程，现在干开了；原来不准备干的工程，现在干起来了；过去需要县办的工程，现在公社办了；过去需要公社办的工程，现在大队办

了。许多地方依靠群众办水利，自力更生地解决了资金、材料、工具等问题，加快了工程进度。二是随着农田基本建设大规模进行和山、水、田、林、路的综合治理，跨社跨队的工程增多了。仅宾阳县就有二十五处工程组织了公社与公社、大队与大队之间的社会主义大协作。各级党委都十分注意对这些工程加强统一的组织和领导，更好地贯彻互利互助的政策。三是充分发挥农田基本建设专业队的骨干作用。

阿尔巴尼亚民主阵线全国委员会发表号召书

以丰硕成果迎接人民会议选举

新华社地拉那一九七七年二月三日电 今年四月三日阿尔巴尼亚将举行人民会议和人民法院的选举。阿尔巴尼亚民主阵线全国委员会二月三日发表号召书，号召全国人民积极行动起来，以丰硕的成果迎接这次选举。

民主阵线全国委员会号召工人阶级发挥领导作用，积极参加国家政治生活，高效率、高质量地进行劳动，节约原料，为祖国生产更多的石油、铬、铁、纺织品和其他工业品；号召农业合作社社员和全体农业劳动

者调动一切力量，模范地完成农业生产方面的任务。

民主阵线全国委员会号召所有劳动者动员起来，最好地全面完成第六个五年计划规定的任务，确保在阿尔巴尼亚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为劳动群众确保美好的未来，增强国家自由与独立，保卫国防和革命成果。

新华社地拉那电 据此间报纸报道，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上沃尔特共和国政府本着发展友好联系与合作的愿望，同意在两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旅日朝鲜人总联合会举行中央大会

热烈欢迎新的朝鲜统一救国方案

越南祖国战线致电支持朝鲜人民的正义斗争

新华社平壤一九七七年二月二日电 据朝鲜中央通讯社报道，旅日朝鲜人总联合会一月二十九日在东京举行了有三千五百多名旅日朝侨参加的中央大会，热烈支持朝鲜各政党和社会团体联席会议提出的早日实现朝鲜自主和平统一的方案。

旅日朝鲜人总联合会中央常任委员会主席韩德铎在会上讲了话。他说，这次联席会议提出的方案，体现了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所阐明的祖国统一方针，反映了全民族一致的统一愿望，是一个最光明正大的爱国爱民族的统一救国方案。我们全体旅日同胞表示热烈地支持和欢迎。

他说，朴正熙集团惧于南朝鲜

人民正确地理解这一新的救国方案，正在进行各种阴谋活动和虚伪宣传。但是，朴正熙集团的挣扎是徒劳的。

他说，旅日朝鲜人总联合会热情支持和支援南朝鲜人民和民主主义自由、民主和国家统一而进行的斗争，并且强烈要求美国放弃对朝鲜的侵略野心，立即接受共国际方面关于签订和平协定的建议，按照联合国的决议，立即撤出美国在南朝鲜的侵略武装。

新华社河内一九七七年二月三日电 据越南报纸报道，越南祖国战线中央委员会二月二日打电报给朝鲜祖国统一民主主义战线中央委员会，热烈欢迎朝鲜各政党和社会团体联席会议一月二十五日通过的

《致南朝鲜各政党、社会团体、各阶层人民和海外同胞的信》。

电报说：“这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各政党和社会团体充满诚意的一个新努力，它反映了全体朝鲜人民要求自主和平统一祖国的迫切愿望。”

电报重申“对朝鲜人民的始终如一的团结情谊和对朝鲜人民争取自主和平统一祖国正义斗争的坚定支持，直到这一斗争取得彻底胜利”。

电报指出：“朝鲜的统一问题必须在没有任何外来势力干涉的情况下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越南人民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将在争取自主和平统一祖国的神圣斗争中取得许多更加巨大的新胜利。”

贯彻自力更生方针 促进农业生产发展

非洲国家大力兴修中小型水利工程

本报讯 非洲的水利资源极为丰富。由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长期掠夺和破坏，丰富的水利资源未能得到开发和利用，农牧业生产因缺乏灌溉而处于落后状态，经不起旱、涝等自然灾害的侵袭。前几年，西非、东非等地区连续发生历史上罕见的旱灾，使非洲许多国家土地荒芜，农作物歉收，牲畜减少，严重地阻碍了这些国家经济的发展。非洲国家和人民为增强对自然灾害的抵抗力，发展以粮食为基础的农业生产，争取粮食自给，采取了各种积极措施，尤其是在自力更生兴修水利方面，取得可喜的成果。在这基础上，去年年底，三十七个非洲国家的代表在埃塞俄比亚首都召开非洲地区开发水利资源会议，交流了开发水利资源的经验，号召非洲国家加强团结合作，自力更生开发水利资源，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这么多的非洲国家代表集合在一起，讨论开发水利问题，是史无前例的。它反映了非洲国家和人民为摆脱超级大国的控制，自力更生兴修水利，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共同愿望。同时，会议的召开，对促进非洲国家之间的团结合作，相互支援，大兴水利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非洲国家和人民为更好地贯彻自力更生兴办水利的方针，采取了以下措施：依靠自己的人力、物力，大兴水利。过去，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瞧不起非洲国家和人民，认为兴修水利只能靠他们。但是，非洲国家和人民不信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那一套，用铁的事实粉碎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无耻谎言和恶毒攻击，建造了一大批中小型水利工程。加纳的达文亚水利工程就是在加纳政府开展“自养运动”中，由群众参加义务劳动修建而成的，其灌溉面积为二千二百英亩。在自力更生精神鼓舞下，目前，加纳全国各地掀起了大办水利的热潮。塔马利以西八哩当地人民，自己动手兴建了一座长二千六百呎、高二十三呎的水坝，待渠道全部修好，可以灌溉二百五十英亩耕地。

以中小型水利工程为主。非洲国家和人民认识到，大型水利工程投资大，收效慢，而且由于非洲国家，不仅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修复了长三百六十米、宽二点五米的卡定浮桥。

修复后的浮桥牢固、平稳，能保证载重十二吨以下的车辆迅速安全通过。

修复后的浮桥牢固、平稳，能保证载重十二吨以下的车辆迅速安全通过。

修复后的浮桥牢固、平稳，能保证载重十二吨以下的车辆迅速安全通过。

修复后的浮桥牢固、平稳，能保证载重十二吨以下的车辆迅速安全通过。

修复后的浮桥牢固、平稳，能保证载重十二吨以下的车辆迅速安全通过。

修复后的浮桥牢固、平稳，能保证载重十二吨以下的车辆迅速安全通过。

修复后的浮桥牢固、平稳，能保证载重十二吨以下的车辆迅速安全通过。

修复后的浮桥牢固、平稳，能保证载重十二吨以下的车辆迅速安全通过。

修复后的浮桥牢固、平稳，能保证载重十二吨以下的车辆迅速安全通过。

修复后的浮桥牢固、平稳，能保证载重十二吨以下的车辆迅速安全通过。

修复后的浮桥牢固、平稳，能保证载重十二吨以下的车辆迅速安全通过。

修复后的浮桥牢固、平稳，能保证载重十二吨以下的车辆迅速安全通过。

修复后的浮桥牢固、平稳，能保证载重十二吨以下的车辆迅速安全通过。

修复后的浮桥牢固、平稳，能保证载重十二吨以下的车辆迅速安全通过。

修复后的浮桥牢固、平稳，能保证载重十二吨以下的车辆迅速安全通过。

修复后的浮桥牢固、平稳，能保证载重十二吨以下的车辆迅速安全通过。

修复后的浮桥牢固、平稳，能保证载重十二吨以下的车辆迅速安全通过。

修复后的浮桥牢固、平稳，能保证载重十二吨以下的车辆迅速安全通过。

修复后的浮桥牢固、平稳，能保证载重十二吨以下的车辆迅速安全通过。

修复后的浮桥牢固、平稳，能保证载重十二吨以下的车辆迅速安全通过。

修复后的浮桥牢固、平稳，能保证载重十二吨以下的车辆迅速安全通过。

修复后的浮桥牢固、平稳，能保证载重十二吨以下的车辆迅速安全通过。

修复后的浮桥牢固、平稳，能保证载重十二吨以下的车辆迅速安全通过。

家资金少，技术人员缺乏，兴修大型水利工程必然要“依赖外援”，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正是利用所谓的“援助”来剥削和控制非洲国家和人民。而中小型水利工程投资少，收效快，非洲国家可以利用自己的资金、劳动力来控制，这样既可以摆脱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控制，又可以培养自己的技术队伍，还可以做到当年动工，当年收益，更快地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因此，非洲国家和人民大力兴建中小型水利工程。佛得角过去由于长期的殖民统治和连续八年的干旱，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粮食几乎全部靠进口。获得独立后的第一年，佛得角政府就利用当地的材料、资金、劳动力，修建了三百座小型堤坝和许多小型水库、小水渠以及数十眼水井，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为减少进口粮食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卢旺达为了根治尼亚布戈河的水害，在国技术人员帮助下，修筑了七千三百八十米的河堤，还在穆瓦古利湖区修建小型水坝，引水灌溉，使水稻获得丰收。

因地制宜，充分利用水源。有些非洲国家境内的河水流量大，他们就拦河截流，兴建水库，满足农业用水。但也有些非洲国家地处沙漠，河水较少，而且流量不大，他们就采取掘井的办法，利用地下水浇地。上沃尔特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于一九七四年打了六百眼水井，修建小型蓄水池二百四十座，一九七五年打井一千眼，一九七六年将达三千五百眼水井，并计划在今后逐步扩大耕地灌溉面积。摩洛哥在利用河水浇地同时，投资三千九百万美元，利用地下水扩大灌溉面积六千三百公顷，改善原来的灌溉系统一千公顷。

增加国家对水利建设的投资。为了更好地促进中小型水利工程的发展，许多非洲国家把水利建设放在发展国民经济的重要地位。尼日尔是西非受旱灾严重的国家之一。为恢复和发展农牧业生产，尼日尔政府在一九七六——一九七八的官方投资中，用于农业发展的资金达二百九十四亿零三百七十万非洲法郎，其中，水利建设投资达八十七亿非洲法郎，约占农业投资的百分之三十。近年由于气候良好而获得农业丰收的突尼斯，也将百分之三十的农业投资用于修建灌溉工程，使水浇地面积从一九六二年的六万公顷扩大到目前的十二万公顷。

加强非洲国家之间的合作。一九七二年塞内加尔、马里和毛里塔尼亚成立塞内加尔开发组织，合作兴建马纳纳塔利水坝，共同开发塞内加尔河流域的水利资源。苏丹和埃及为加强经济合作，由埃及在苏丹打一百眼井，并在德瓦伊姆地区安装了二百个埃及生产的供水设备，同时，两国签订协定，在苏丹南部开凿杰格莱运河，使苏丹能够开垦五十多万费丹土地种植水稻。多哥和贝宁等国开始研究莫诺河水电治理计划，在贝宁和多哥边界的阿塔克帕姆附近修建水坝，除供电外，还可以灌溉和开垦四万公顷良田。

非洲国家自力更生，兴办中小型水利工程，使农牧业生产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恢复和发展。上沃尔特全国十一个省中已有九个省达到粮食自给，农业生产已超过大旱灾年水平。尼日尔的水稻产量也不断增加，一九七一——一九七二年度水稻产量为三万八千吨，一九七四——一九七五年度已增为六万五千吨，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十九点六。乍得一九七五——一九七六年度粮食总产量为五十九万四千多吨，全国有牛三百五十万头，羊五百万只，比前几年都有明显增长。

事实证明，非洲国家和人民自力更生，兴修中小型水利工程的道路是正确的，是大有可为的，它必将为农牧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的发展，摆脱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剥削和控制，独立自主发展民族经济，作出更大的贡献。

克服了困难，看到了自己的力量，终于随着革命的胜利赢得了自由解放。这是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消除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势力的压迫，我们妇女充满了信心，一定能把革命组织交给我们的工作做好。”

其实，岂只是在盐业生产上，柬埔寨妇女在各条战线上都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记得我们在经过六号公路上的的一座大桥时，陪同我们的柬埔寨朋友曾深情地向我们讲述一支妇女运输队的战斗故事。当时这座大桥被敌人炸断，前线部队的供应有被截断的危险。就是这支英勇无畏的妇女运输队，千方百计地用自行车、牛车、小船、肩挑、头顶等办法，不怕牺牲，把粮食和弹药源源不断地运到前方。这位柬埔寨朋友还遗憾地向我们表示，解放后，这批妇女已经转业到工业、农业等各个部门去了，要采访她们是比较困难了。但是，通过这些日子的访问，我们不是在脱机厂女工车、吴哥则农业合作社社员和贡布干丹盐场的女盐工身上，重新发现了她们的飒爽英姿了吗！

在离开贡布干丹盐场的时刻，我们目睹一队女盐工整齐地排列在盐田中心，冒着烈日的烤晒，进行着紧张的压滩劳动。伴随着打夯的节奏，她们齐声歌唱：

我们是盐田工人，胸怀着一颗红心，响应革命组织的号召，为生产原盐而奋斗。我们的任务十分光荣，为满足人民需要积极劳动，不怕风吹、日晒、雨淋，把盐田管好是我们的责任。

这热情奔放的歌声，仿佛化作盐业工人的庄严誓言，在百里盐滩的上空震荡，回响。柬埔寨的盐业工人，同广大工农兵一起，在保卫祖国、建设祖国的战斗道路上豪迈地胜利前进！

克服了困难，看到了自己的力量，终于随着革命的胜利赢得了自由解放。这是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消除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势力的压迫，我们妇女充满了信心，一定能把革命组织交给我们的工作做好。”

其实，岂只是在盐业生产上，柬埔寨妇女在各条战线上都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记得我们在经过六号公路上的的一座大桥时，陪同我们的柬埔寨朋友曾深情地向我们讲述一支妇女运输队的战斗故事。当时这座大桥被敌人炸断，前线部队的供应有被截断的危险。就是这支英勇无畏的妇女运输队，千方百计地用自行车、牛车、小船、肩挑、头顶等办法，不怕牺牲，把粮食和弹药源源不断地运到前方。这位柬埔寨朋友还遗憾地向我们表示，解放后，这批妇女已经转业到工业、农业等各个部门去了，要采访她们是比较困难了。但是，通过这些日子的访问，我们不是

在脱机厂女工车、吴哥则农业合作社社员和贡布干丹盐场的女盐工身上，重新发现了她们的飒爽英姿了吗！

在离开贡布干丹盐场的时刻，我们目睹一队女盐工整齐地排列在盐田中心，冒着烈日的烤晒，进行着紧张的压滩劳动。伴随着打夯的节奏，她们齐声歌唱：

我们是盐田工人，胸怀着一颗红心，响应革命组织的号召，为生产原盐而奋斗。我们的任务十分光荣，为满足人民需要积极劳动，不怕风吹、日晒、雨淋，把盐田管好是我们的责任。

这热情奔放的歌声，仿佛化作盐业工人的庄严誓言，在百里盐滩的上空震荡，回响。柬埔寨的盐业工人，同广大工农兵一起，在保卫祖国、建设祖国的战斗道路上豪迈地胜利前进！

百里盐滩上的歌声

中国新闻代表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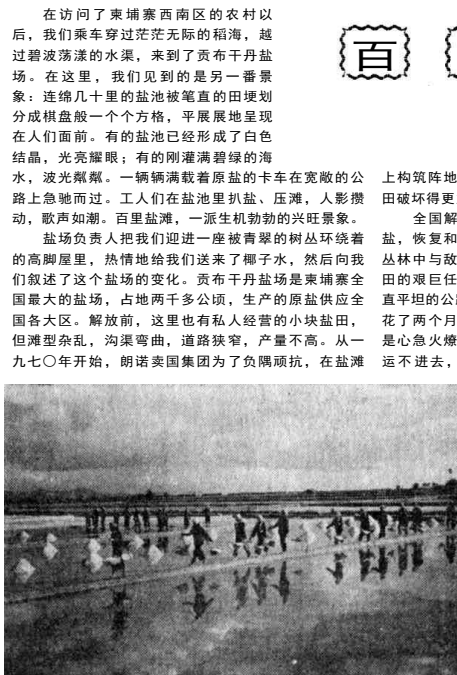
上构筑阵地，埋地雷，设障碍，把原来支离破碎的盐田破坏得更加不象样子，面目全非。

全国解放以后，国家建设需要盐，人民生活需要盐，恢复和发展贡布干丹盐田的战斗打响了。当年在丛林中与敌人周旋的战士，现在又面临着开辟茫茫盐田的艰巨任务。我们最早来到盐田的女盐工，指着笔直平坦的公路对我们说：“这条长达十公里的路是我们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冒着酷暑修修出来的。当时我们真是心急火燎。没有路，人进不了盐田，工具和设备也运不进去，而人民群众却翘首等着我们把盐运出来。”于是，盐工们一面修路，一面在盐田里排除地雷和故障，把坑坑洼洼的河塘和弯弯曲曲的沟渠填平，接着修建储水池、压滩、筑堤、造闸。他们发挥了冲天干劲，顶着星星下滩，背着月影收工，经过连续两个月的奋战，贡布干丹盐场的第一批晶莹闪光的原盐，于一九五五年八月生产出来了。

我们一边听着盐场负责人的介绍，一边走下高脚屋沿着笔直的道路走去。平坦如镜的盐田一望无际地向远方延伸，纵横交错的条条沟渠，织成了四通八达的水网。当时骄阳似火，晴空万里，是大好的产盐季节。为了抢在雨季前多产盐，盐工们在盐田里一字长蛇阵似地摆开，扒盐的扒盐，压滩的压滩，紧张地战斗着。盐场负责人告诉我们，“盐田的机械化程度还不高，主要依靠工人群众的积

极性和创造性。盐工们开动脑筋想办法，把敌人扔弃的机器改建成水泵，修复了一些脚踏水车，大大提高了产盐效率。由于全体盐工们的积极努力，去年出盐时间比前年提前了一个月，产量也超过前年。”我们还看到，在公路两旁耸立着的椰子树和糖棕树荫下，掩映着一排排新建的房屋，这是盐工们趁雨季闲暇时修建的盐仓仓库。工人们还在盐田周围种了水稻和蔬菜，饲养了鸡鸭等家禽，想方设法减轻国家的负担。

在贡布干丹盐场，我们看到了柬埔寨妇女在建设盐田斗争中发挥的巨大作用。解放前，柬埔寨妇女是不参加盐业生产的。这不仅是因为妇女在旧社会没有地位，而且一般都认为盐田劳动是重活，妇女干不了。但是，现在情况变了，在贡布干丹盐场的工人中，女工竟占百分之九十六。这些女工大部分是从女兵师转业来的，经历过战争的考验，具有坚强的革命意志。开始对盐业生产不熟悉，她们就耐心地学，很快就能独立工作了。象放水、添卤、收盐等技术活，她们都干得很出色。我们在车上遇到一个年轻女盐工，解放前在家乡桑布村的医院工作。她愤怒地控诉了美国帝国主义和朗诺卖国集团对人民群众的迫害，造成她家庭的离散。她于一九七一年参加了革命军，转战在四号公路上，亲手歼灭了不少人。现在，她又转业到盐场当工人，为人民群众生产原盐。我们会见了盐场的一个妇女负责人，她过去是革命军的一个团长，负责西南地区基地的工作。这位身经百战的女战士向我们表达了解放了柬埔寨妇女的豪迈心情：“柬埔寨的大批妇女在民族解放战争期间参加了革命。她们



图为贡布盐场战士在收盐。

新华社记者摄

新海霸者的自供状

——评戈尔什科夫的《国家的海上实力》一书

海军某部 鲁南 秦廉新

在超级大国加剧全球争霸的喧嚣声中，苏海军头目戈尔什科夫去年又炮制了一部名为《国家的海上实力》的书。作者在这本洋洋数万言的著作中，大肆宣扬帝国主义的“海上武力论”，发出一片战争威胁的叫嚣。打开此书，老沙皇的迷梦、新沙皇的贪婪跃然纸上。这本书就好像在它是一份难得的新海霸的自供状。

“炮舰政策”的破旗

为了对外扩张，戈尔什科夫公然打出老牌帝国主义“炮舰政策”的破旗，毫不掩饰地宣称，要把海军作为“外交的重要支柱”。他操着帝国主义的腔调叫嚷：“外交问题总是在谈判双方的军事实力的基础上解决的”，“在许多情况下不必诉诸武力，仅仅用自己的潜在威力和以开战相威胁来施加压力，就可以达到政治目的”。真是不打自招！按照苏修老爷们的逻辑，只要有了强大的武力，就可以对别的国家进行压迫、威胁和讹诈，达到侵略扩张的“政治目的”。戈尔什科夫比起勃列日涅夫来，较为坦率一点，他不把“缓和”和“缓和”、“缓和”放在嘴上骗人，而是直截了当地喊着武力、武力、武力；军舰、大炮、导弹。

其实，戈尔什科夫的“炮舰政策”的叫嚷，苏修早就在海外付诸实践了。远的不说，一九七六年三月，埃及人民由于对苏修的干涉和控制忍无可忍，终于把苏联海军赶出了亚历山大港。但是苏修竟利用黎巴嫩局势动乱之机，向地中海急剧增派大量舰只，包括四万吨级的“基辅号”航空母舰，妄图以武力威胁达到称霸中东的罪恶目的。很显然，戈尔什科夫宣称要把海军作为“外交的重要支柱”，实质上就是要把海军作为苏修推行霸权主义和进行侵略扩张的“支柱”。

戈尔什科夫在谈到夺取“制海权”的重要性时，捶胸顿足地发誓：“我可以不怕犯错误地大胆断言”，没有比制海权“更有生命力的概念了”。请注意，苏联是一个有二千二百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大国，却还嫌不够，还要控制各大洋，掌握“制海权”，其扩张胃口可谓大矣！

事实正是如此。苏修的舰只在大西洋、地中海、太平洋、印度洋，在他们能够达到的每一切海域，横冲直闯，来往频繁，千方百计地夺取那里的制海权。难

怪西方舆论界惊呼：波罗的海成了“公认的俄国湖”，巴伦支海和挪威海成了苏联的“内海”，日本海也成了“苏联海”。然而戈尔什科夫承认：“苏联海军一向认为夺取制海权不是目的”，而只是为“控制世界”建立“一定的前提条件”。一语道破了苏修新沙皇争夺制海权进而称霸世界的狂妄野心。

苏修作为世界海洋筵席的迟到来者，处心积虑要重新“瓜分和开发海洋”。戈尔什科夫直言不讳地说：“苏联能同意西方海洋大国对海洋的永恒统治吗？当然不能”，要“迫使五角大楼意识到，原先保护美洲不受攻击的大洋，已完全失去了原先的那种屏障作用”。扬言要在一场新的世界大战中打败美国，使美国“本身就面临会每日每时地受到惩罚的打击这一可怕的威胁”。在和美帝争霸海洋的野心驱使下，苏修海军多次举行了以美国为假想敌的海上演习。苏修咄咄逼人，美国也不示弱。这些年来，苏美海上争霸的丑剧愈演愈烈，遍及各大洋，搅得恶浪翻滚，使世界不得安宁。

侵略有理的强盗理论

戈尔什科夫还苦心编造了一套侵略有理的强盗理论，极力为其侵略扩张政策辩护。

一日“国外利益论”。戈尔什科夫宣称，发展海军是为了“高效能地保障”苏联“在国外的国家利益”。人们不禁要问，苏联的国家利益怎么跑到国外去了呢？这种“利益”怎么还需要用军舰去保护呢？回答是十分清楚的。这些年来，苏修在推行其反革命全球战略中确实把黑手伸到了世界许多地区，把侵略别国、掠夺别国当成了它的“国家利益”，这当然就要它的炮舰去保护了。君不见，它在印度洋上经常部署着二十多艘舰只的分舰队，攫取了十几个港口的使用权，保护着它在这一地区的“利益”。在非洲，它谋取了十几个港口和机场，变成了用以对外侵略和渗透的综合基地。也就是在这种“保护”下，苏修大肆掠夺这些地区的丰富资源，威胁别国的安全。显然，戈尔什科

夫的“国外利益论”，是帝国主义的世界侵略政策的典型论调，是侵略扩张的代用词。

二曰“安全需要论”。戈尔什科夫装出一副受委屈的样子说：别国“不断威胁着我国的安全”，把海军“派往大洋”，是为了“可靠地保卫自己不受来自辽阔的大洋的袭击”。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里，戈尔什科夫在玩弄贼喊捉贼的把戏。

苏修叛徒集团上台以来，拼命建造进攻性的远洋导弹核潜艇和航空母舰，它的绝大部分舰只远离自己的领海，部署在世界各大洋。试问，这难道是为了“安全”的需要吗？否！这完全是为了同美帝争霸的需要，是对外侵略扩张的需要。非但如此，苏修的军舰还肆无忌惮地闯进别国近海，进行侦察破坏活动。这到底是谁威胁谁的安全，不是一清二楚了吗？戈尔什科夫的所谓“安全需要”，实际上就是“扩张需要”。

三曰“海洋自由论”。戈尔什科夫一再喋喋不休地说：海洋是“中立的”、“自由的”、“无主的”，因此，“海洋对所有人开放”。

好一个“自由的”海洋！这是指海上通航自由吗？不是！你们倚仗海上实力，随心所欲地把海区划为自己的训练场所，禁止别国船只通航和生产，完全破坏了海上通航自由。是指开发海洋资源的自由吗？也不是！你们凭借先进技术和装备，在炮舰保护下，任意掠夺海洋资源，而使广大中小国家深受其害。戈尔什科夫如此起劲地鼓吹“海洋自由”用意何在？他自己就供认：世界海洋的“中立”和“自由”，有助于苏联海军“调动和集结兵力，而不致在形式上给敌方造成抗议或采取其它对抗形式的借口”。一副伪善的海盗嘴脸，暴露无遗。

老沙皇的幽灵重现

“任何俄国人，只要他是沙文主义者，迟早总会拜倒在沙皇政府的面前”。（恩格斯：《俄国沙皇政府

的对外政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18页）戈尔什科夫就是这样一个跪倒在沙皇脚下的无耻叛徒。他的《国家的海上实力》一书，从头到尾，片片纸上，字里行间都显示着老沙皇的幽灵。

老沙皇彼得一世是作为“海监”的同义词载入帝国主义侵略史册的。但戈尔什科夫却以后继者的崇敬，把他捧为苏联海军的开山鼻祖，说什么：“俄国常备海军的建立”是“同彼得大帝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戈尔什科夫在书中多次为老沙皇涂脂抹粉，恬不知耻地把老沙皇标榜成苏修的“先师”。恩格斯曾以极大的义愤，无情地抨击老沙皇的侵略罪行，指出老沙皇“有多大本领就能干出多大的伤天害理的事情”。（《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17页）可是，戈尔什科夫却把老沙皇并吞克里米亚、逼迫土耳其缔结不平条约等野蛮侵略行径，当作英雄业绩加以颂扬。总之，在戈尔什科夫的笔下，老沙皇三百七十多年充满了凶恶、贪婪和血腥的侵略史，都成了苏修叛徒集团的“英雄家谱”。真是无耻到了极点！

戈尔什科夫极力往老沙皇脸上贴金，正是为了步老沙皇的后尘，继承老沙皇的衣钵，实现老沙皇梦寐以求的统治世界的“霸业”。

彼得一世曾露骨地把沙俄陆军和海军比作他向外侵略扩张的两只魔爪，叫嚷：“只有陆军的统治者才算有一支手，而同时还有海军的统治者才是双手俱全”。戈尔什科夫对老沙皇的争霸秘诀心领神会，狂叫：“没有强大的海军，俄国是不可能进入国际行列的”，宣称要继承老沙皇的“光荣传统”，把海军作为争霸的工具。当年，彼得一世在大干罪恶勾当的时候，指令沙俄军队要“长期保持战争状态”；戈尔什科夫则训斥：苏联海军要“经常处于高度的战备和动员状态”。不仅思想是彼得一世的，连语言也几乎一样。戈尔什科夫真不愧是老沙皇的最虔诚的孝子贤孙。

苏修叛徒集团自五十年代中期上台以来，不顾苏联人民的死活，扩大军费开支，大规模地建造核潜艇和航空母舰等远洋进攻舰只，重新恢复并扩充供侵略用的海军陆战队，推行向全球扩张的海洋战略。戈尔什科夫的《国家的海上实力》一书，充分暴露了这一狂妄野心。

弱的一环，为了丹麦的安全和政治独立，丹麦需要在一系列方面加强自己的防御实力。削弱现有的防务安排则是轻率的。基督教人民党国防问题发言人保罗·勒勒在发言中说，我们必须承认当前国家面临的形势是十分严重的。

基督教人民党议员本特·霍内勒批评的这些政党要求丹麦单方面裁军的主张。他说，他们的政策会助长苏联领导人从事军事冒险，使他们在寻求对西欧和丹麦的军事征服。要西欧单方面裁军的主张只会增加战争的危险。

丹麦国防大臣和议员警惕日益紧逼的苏联威胁

丢掉幻想 加强防务 维护国家安全

能减少。议会国防委员会主席阿尔内·克里斯蒂安森说，苏联建设全球性舰队，使华沙条约国对丹麦海峡及其附近海域进一步产生了兴趣。他们加紧海上活动，并且从波罗的海遥远的地方移向大贝尔特海峡和厄勒海峡。大型登陆艇围绕西兰岛游弋。华沙条约国的扫雷部队不断在赫瑟奥和安霍特周围海域举行扫雷演习。众所周知，最近时期华沙条约国在波恩霍尔姆附近加紧飞行活动以便干扰和侦察丹麦的警报系统。

人民保守党主席保罗拉·什卢特说，苏联和一些东方国家一直在大力加强军备和加强其军事潜力。不论是在全球还是在丹麦的附近地区，实力平衡发生了变化。当会议在不久的将来制定我们新的防务体制的时候，应该以这一严峻的现实为基础，而不是以那种靠不住的“缓和”的谈论为依据。

什卢特指出，苏联在科拉半岛的军事建设使整个北欧的战略意义增加了。苏联近几年来自丹麦的领土和整个北欧的领土表现出越来越大的不正当的兴趣。这应该被看作是和在平时时期的一种危险的和挑衅性的升级的见证。

特别的间谍船日益频繁地出现和逼近丹麦附近海域。

在最近几年里华沙条约国在丹麦水域的舰队活动增加了许多倍，并让其人员熟悉丹麦的沿海地区。过去在丹麦地区附近举行的两栖登陆演习，后来越来越向西部推移。众所周知，苏联飞机的飞行活动越来越靠近丹麦的领土。

什卢特强调说，丹麦处于防御联盟中的比较薄

希腊和土耳其两国外长会谈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二月一日讯 斯特拉斯堡消息：希腊外长维齐奥斯和土耳其外长查拉扬古尔一月二十九日在法国斯特拉斯堡郊区举行会谈。他们讨论了两国在爱琴海的争端问题以及塞浦路斯问题。

两位部长在会谈后发表的声明中表示，希望能够找到一个迅速解决爱琴海空域争端的办法，并将继续进行外交接触。

他们在声明中还表示对塞浦路斯总统马卡里奥斯和塞浦路斯土族领导人登克塔什最近举行的会谈感到满意。

他们还表示，希望塞浦路斯希土两族这次重新谈判能够导致塞浦路斯问题的“公正和平等的解决”。

两个超级大国最近都竭力表示希望尽快就签订限制战略武器新协定达成协议。英国《经济学家》杂志认为问题并不那样简单，因为双方都想压倒对手，不可能取得真正的核力量均势。作者说，苏美之间有一个争吵不休的“数学问题”：多少桔子能和多少苹果相等；而这是任何计算机也无法计算的问题。

应当指出，即使有一种“超级计算机”可以把这个问题算出来，苏美再签订一个新的协定，也不是双方协议你有多少桔子，他就应该有多少苹果。其结果也只能象英国这家杂志所预言的，那样的“协议连那

张纸都不值”。

× × ×

莫斯科红场上又发生了一起自焚抗议苏修统治的事件。苏修当局先是矢口否认其事，后来又不得已予以承认，并且说这个人的烧伤治好后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勃列日涅夫集团宣布把一个自焚的苏联公民送进了“精神病院”，就是公开承认，今日逼苏联的“精神病院”，是镇压不满和反抗苏修法西斯统治的苏联人民的变相监狱。



西欧国家联合起来加强防务对付苏联侵略企图

英国军政界人士谴责苏联侈谈“缓和”疯狂扩军

新华社堪培拉一九七七年二月二日电 据《悉尼先驱晨报》二月二日报道，英国皇家海军司令约翰·特雷彻爵士海军上将要求对苏联在海洋上的扩张提高警惕。

据报道，特雷彻于二月一日到达澳大利亚进行访问时在悉尼机场发表谈话说，苏联越来越意识到它能在各大洋的军事和商业利益中增强实力。俄国人在印度洋的活动中显示的这种日益明显的动向特别值得注意。

特雷彻说，“大多数航运公司对苏联的这种动向，对日益扩大的苏联商船队和舰队的巨大潜力已有充分认识。”“印度洋是俄国人越来越关心并建立军事实基地的地区之一，也很可能是观测俄国未来动向的关键地区。”

特雷彻在谈话中还强调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要在常规武装力量方面做好准备。

新华社伦敦一九七七年二月三日电 最近，英国一些政界人士发表讲话和文章，强烈谴责苏苏联在“缓和”骗局的掩盖下，疯狂进行扩军备战，主张西欧国家联合起来，加强防务，对付苏联的任何侵略企图。

前保守党政府首相爱德华·希思最近对驻伦敦的外国记者发表讲话时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上发生的重大变化之一是苏联已变成一个不仅威胁欧洲、而且也威胁着世界其他地区的世界大国。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谈论得如此之多的缓和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如果你真的要和平，你就必须确保你所拥有的实力足以对付得了只知道奉行实力政策的苏联的任何侵略企图”。希思在讲话中强调了西欧国家联合的重要性，说，“欧洲必须共同制订一项外交政策”，他还说，无论是从政治上来看，还是从经济利益上考虑，欧洲经济共同体都应该得到加强和扩大。希思还指出，“欧洲应该在外交和贸易安排方面加强同中国的联系”。

保守党国防事务发言人温斯顿·丘吉尔一月二十七日在伦敦发表的一次讲话中说，“西方同苏联谈‘缓和’谈了四年，在这四年中，尽管西方（包括美国在内）一直在削减防务，而苏联却一直是在急剧地增加军备。现在所有的证据都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苏联企图获得军事上的优势，从而支配西方。”

丘吉尔列举了苏联大规模扩军备战的一些事实，他说“苏联已经取得了同美国在战略和技术核武器方面的均势。在欧洲，苏联已在常规力量方面取得了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优势，它的坦克、飞机和人力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相比约为三比一”。他指出，“苏联军事力量的增长远远超过任何自卫的需要”。

丘吉尔认为，西方国家必须加以加强防务来表明它们对付苏联挑战的决心。他说，“正如捷克斯洛伐克人在一九六八年那样，如果我们没有自卫能力，我们就会被征服。但是我们不会象捷克斯洛伐克人……我们现在仍有时间弥补我们在防务方面的明显弱点。决不是一切都丧失了。但是时间是不多了。”他警告说，“如果我们目前所做的一样，实行单方面裁军的灾难性政策，我们就不能回答苏联的挑战”。

查尔方特勒爵一月三十一日在《泰晤士报》发表的一篇文章驳斥了西方国家因为经济困难而削减国防费用的谬论。他说，“面对苏联目前军事实力，西方如果相信拆除它的安全设施就能够解决它的经济问题，那是十分荒唐的”。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缓和”烟幕掩盖下，疯狂扩军备战，频繁举行进攻性的军事演习。

新华社发